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ZHANG JU ZHENG JIANG PING DA XUE ZHONG YONG

大学
中庸

修订本

陈生玺等 译解

上海辞书出版社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ZHANG JU ZHENG JIANG PING DA XUE ZHONG YONG

大学
中庸

修订本

陈生玺等译解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陈生玺等译解.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26-3979-3

I. ①张… II. ①陈… III. ①儒家②《大学》—研究③《中庸》—研究 IV. ①B22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4783 号

责任编辑 郁 蕙
装帧设计 多 吉

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修订本)

陈生玺等译解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70 毫米 1/16 印张 10 字数 150 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979-3/B·244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391383

用历史的观点解读《四书》

陈生玺

“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把中国的历史完全弄颠倒了，当时全国上下从电台、报纸、大中小学课堂、工厂车间、农村田间地头，都要批判孔子，好像中国现实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两千年前的孔子而来。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宣传运动之下，虽然没有起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效果，但也确实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搞乱了。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的普通群众，这种先入为主、反复灌输的方式，给人们潜在的意识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流毒极为深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人们提到孔子或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乍一听到便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甚至挑毛病，调侃揶揄，张口闭口“孔老二”云云。所以今天我们重读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著作，如何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从而理解它的真实意义，仍是学界一项重大任务。例如《四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作品，自秦汉以后乃为士子常读和必读之书，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尤其是宋元以后，将其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不仅上自中央的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以及乡村私塾，凡是读书者人人必读，就是最高统治层的皇家，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也要读。这部明代《四书》皇家读本，就是明代万历初年（1573—1582年）大学士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皇帝朱翊钧讲解《四书》的讲章，经修改后进呈皇帝在宫内阅读，定名为《四书直解》。由于朱翊钧初即皇帝位时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所以这本讲稿用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今天仍不失为初读《四书》一本较好的辅助材料，我们将它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但因过去长时间极左思潮对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的歪曲，先定性，后分析，摘其所要者大加挞伐，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重读《四书》时，首先应该摒弃这种新传统的偏见。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曾说：“对于古

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见冯友兰《三松堂集》）这就是说，我们对古人的著作，应该设身处地了解其所处之历史环境，同时也把自己融入这种环境之中，以此来理解古人，才能评论他的是非得失。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按照《四书》的原意，将《四书》中的一些基本要点简要地介绍给读者，让读者按照《四书》作者的原意来理解《四书》，而不是以今天的是非观念来理解《四书》。因为我们今天与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是非观念亦不大相同，例如孔子讲君君、臣臣，今天我们是共和时代，人人都是平等的，若是按照今天的观念去看古代，那不是觉得太可笑而不可理解了吗？

《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论语》、《孟子》秦汉以后，都以单行本行于世，汉文帝（前 179—前 157 年）曾对《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设博士官，称“传记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 136 年）设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大学》、《中庸》乃小戴《礼记》中之两篇著作，《礼记》乃六经（五经加乐经）之一，亦置博士官。所以从汉代开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当时宫廷和士子必须研读之书。到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予以整理，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为学进德次序，先《大学》、《中庸》，次《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定为学者学习入德之门。朱熹（1130—1200 年）以毕生精力加以注释，称《四书集注》，《四书》之名自此确立。元代皇庆二年（1313 年），元仁宗下令元朝也仿唐宋制度实行科举取士，规定考试题目必在《四书》之中，发挥题意即以朱注为依据，直到明清两代，六百年相沿未改，所以《四书》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必须加以认真研究。

2006 年 10 月

绪 言

陈生玺

《大 学》

《大学》乃《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乃汉宣帝时五经博士戴圣从先秦遗留的典籍中编撰而成，说为春秋时曾子所撰，曾子（前 505—前 435 年），名参，鲁国人，他和父亲曾点同是孔子的学生，曾亲聆孔子的教言。此书乃发挥孔子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宏阔纲领，主要内容有三纲、八目。什么叫“大学”，据汉代郑玄（127—209 年）的解释：“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大学就是广博的学习。宋代朱熹则解释说：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仪，十五岁入大学，以公卿大夫贵族子弟与庶民之俊秀者为主，学习进德修业治人的大道理，所以“大学者乃大人之学也。”总之，大学属于成人性的教育，以修养品德和将来治人从政为目的。

《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根本道理，在于彰明人自身的光明德性，使之除旧布新而成为新人，以达到完美至善的境地。这就是大学的三纲。儒家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纯洁而光明的德性，即明德，由于后天受社会习染而产生各种不良的欲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认识恢复自身的这种德性，革除一切不良的污染，而成为新人，从思想品德和行为上达到最完美至善的境地。怎样才能达到“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呢？有八项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项条目中则以修身为中心。他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说，要彰明自身的光明德性，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庭，要整齐自己的家庭，必先修养自身

的品德,要修养自身的品德,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诚,要意念真诚,必先有明确的认识,认识明确在于明达事物的道理。他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达事物的道理之后认识就明确了,认识明确后意念就真诚了,意念真诚后心志就端正了。心志端正后就能修养好自身的品德,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后,就能整齐自己的家庭,家庭整齐后就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国家治理好以后才能平定天下。从天子直到平民百姓,都要以修养自身的品德作为根本。只有完成这八项步骤才能达到完美至善的境地。这里的国家是指诸侯封国,天下指周王朝所统御下包括各诸侯的全中国。

在八目中,他特别强调诚意,认为一个人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关键在于诚意。所谓诚意就是要意念真诚,没有虚假,就必须“慎独”,“慎独”,就是谨慎地对待自己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和行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说的诚意,就是说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污秽的臭气,如同喜好美好颜色,这都是出于自己的本心而毫无愧疚,所以君子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他举例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那些无德的小人一个人独处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但见了君子都要躲躲闪闪,掩盖自己的不善而故意表露出自己的善,实际这是没有用的,别人看你如同看到了你的心肝,是掩盖不了的。“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真诚与否必然要显露于外,所以君子独处时一定要谨慎。“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曾子说,一个人在独处时,也有十只眼睛盯着你,十手指着你,多么严酷啊!这就告诉人们,在任何时候,即使自己一个人独处时,也要真诚,不要欺骗自己,若有不善之念,要及时反省克服,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而隐瞒。先不自欺,然后才能不欺人,不自欺比不欺人更难。

在修身这一节目中特别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人对自己所亲爱的人只知其善而不知其恶,对自己厌恶的人只知其恶而不知其善,这叫做辟。只有克服了这种辟,才能齐家。他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

人之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要整齐自己的家庭在于修养自己的品德者，是因为人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多有所偏爱，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多有所偏恨。因此对喜欢的人知道他的坏处，对厌恶的人知道他的好处，这种情况太少了，所以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都不满足自己田里禾苗的壮实。这就是不修养好自身就不能整齐自己家庭的原因。这里的家，不仅指人们的家庭也包括卿大夫的采地食邑。

把家治理好了，就会给人民提供一个好的表率 and 示范作用，“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个家庭实行仁爱，一国也会跟着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一国也会跟着兴起谦让，君主一个人贪婪残暴，一个国家就会产生混乱。他举例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尧舜用仁爱率领天下，人民也就跟着实行仁爱；桀纣用凶暴号令天下，人民也就跟着兴起凶暴，他的命令和他自身的行为相反，人们是不会服从的。因此君子只有先自己做到了，再要求别人，自己不先做，才能禁止别人。所以只有把身修好了，把家整齐了，才能治国平天下。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实行絜矩之道。絜是衡量，矩是方形的尺子。絜矩之道就是以自身为尺度去衡量别人，用这一道理去治理国家。对此他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就是说在上位的统治者尊敬老人，就会在民众中兴起孝道；在上位的人尊敬长上，在民众中就会兴起悌道；在上位的人抚恤孤寡，民众就不会背叛。这就是君子实行絜矩之道的作用。你厌恶在上者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下面，你厌恶在下者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上面，你厌恶前边人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后面，等等。总之要推己以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儒家的德治思想，他们认为有了德，能团结人民，也就有了土地，有了财物，有了财物，就可以供人使用。“有德此有人，有人有此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就是儒家所主张治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道理。

《中 庸》

《中庸》，传为孔子的孙子战国时子思所撰，子思（前483—前402年），名伋，鲁国人，曾为鲁缪公师。《中庸》一书的基本思想是讲中和，反对“过”和“不及”。所谓过就是超过，不及就是没有达到，过与不及的标准就是中，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不可改易。所以中庸就是平常而不可改易的中正和谐的道理。

《中庸》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天赋予人的就是性，遵循这种性行事就是道，按照这种道进行修养就是教，教包括教育和教化。这乃是全书的纲领。《中庸》的作者和《大学》相同，都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中庸》全书阐明人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善良本性，遵循这种本性的天道而进行自我修养。他认为人有喜怒哀乐，人的本性即表现在喜怒哀乐之中。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发生的时候叫做中，发生出来合乎节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人们达到中和，天地就会各在其位，万物就会成长发育。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时，心情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它包含着人的本性，发生之后要合乎人们认同的常规常理，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和。人类社会和外在世界只有在这种和的状态中才能很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他认为中庸是一种很高的道德，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已经很少有人能实行了，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理，但是老百姓已经很久不能做到了。为什么，他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焉；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因为聪明的人行为往往超过，愚笨的人则不及。中庸之道不能彰明的原因，是因为贤能的人认为自己高明，不值得学习，愚笨无能的人则不知道应该学习，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庸之道对人的切身意义，好比人人都要吃饭，但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

中庸学说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忠恕思想，他说：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做到忠恕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别人施加给自己不愿意的事情，自己也不要施加于别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卫灵公》）。中庸主张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但过和不及在各个时代，会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而有不同的标准，其中也包含着差异和不同。怎样的思想和行动才算合乎中庸之道？通过子路问强，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子路问怎样才算强？孔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还是北方人的强？还是你认为的强？用宽和的精神感化人，对于横行霸道的人不进行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乐于这种强。用兵器作为卧席，战斗死而不悔，这是北方人的强，特强的人乐于这种强。君子与人和睦而不随波逐流，坚持中庸而不偏倚，这是多么坚强啊！政治清明不改往时的志向，政治黑暗至死不改变平时的操守，多么坚强啊！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南方人的强，“不报无道”是不及，北方人的强，“死而不厌”是超过，只有“和而不流”，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动摇，才是真正中庸之道，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主义。

中庸强调的是人治思想，“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是说贤人在位，好的政令就能实行，贤人没有了，政事也就消亡了。人道的法则是勤于政事，地道的法则是培育树木的成长，政事好比芦苇，只要你用力，很快就会成长起来。所以为政在于得人，而得人在于修身，而修身在于遵循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就是从仁做起。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就是爱人，以亲爱亲族为最大；义就是相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将仁义推广而言，就是如何对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通称五达道，五种通行天下的道理，即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人人应各守其道。要实现这五达道，必须有三达德，通行于天下的三种道德：知、仁、勇，他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

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道努力学习，就接近智了，尽力去实行就接近仁了，知道耻辱就接近勇了，知道这三者，就知道怎样修身，知道怎样修身就知道怎样治理人群以至治理国家天下了。这里智、仁、勇虽是强调修身，然而在今天来看，它强调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包括道德、知识和能力。

中庸之道又强调它的普遍性，所谓“费而隐”，效用广大而道理却很隐微，大而无所不在，小而隐微不显，存在于日常各种事物之中，所以人要体认中庸之道，必须从心灵的深处回复自己的天性，然后从此出发，修己治人。

一是“慎独”。这和《大学》所讲相同，但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之道是人片刻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那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君子在自己还没有看到时也要谨慎警戒，在自己还没有听见时也要恐慌畏惧，因为人心从没有比在幽暗中最为明显，没有比在细微时最为显著，因此君子在独处时应该谨慎。这是要人们在思想的源头上，在一个人独处意念发生时，就要怀着恐慌畏惧的心理，警惕自己以防一念不善的产生。因为在这个时候，意念之善与不善，自己是最清楚的。这就是儒家修身条目中特有的自律观念。

其次是“诚”。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实在而没有虚假。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地万物自身生存的道理，达到诚是人应该遵循的道理。赋予诚以精神的意义，是在强调诚的重要性。人应该真诚，人如何达到真诚呢？他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要达到真诚，必须选择善事而坚持固守，广博地学习，仔细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晰地辨别，认真地实行。学习要坚持到底，以学会为止，问以问明白为止，思考以得到要领为止。“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一次就会，自己就用百次；别人用十次，自己就用一千次。只要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即使愚昧的人也会变得聪明，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人的学习作用，人通过学习也能达到诚。

诚的作用在于能“尽性”。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本

性。只有最真诚的人,才能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发挥自己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发挥众人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事物的本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能发挥事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万物,人可以处在与天地并列的地位。这是说人通过发挥自己的本性,认识外在世界,按照外在世界的本性去参与治理外在世界的活动。

诚不但是“成己”,关键是还能“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成己就是使自己道德完善,是仁;成物就是从自己出发而推己及人而成就他人和外物,是智。仁智合在一起,以此来治理国家天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天下只有最高道德和最大智慧的人,才能治理。所以它要求“君子尊德行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们要尊崇自己的天然本性,必须经过学习询问,要达到广大的境地,又必须详尽到精微之处,要达到极高明的地步,必须实行中庸之道。这乃是全书的总结,他强调人要达到中庸之道,必须进行修养,修养的方法就是在尊崇天然本性的基础上学习并且认真地去实行。

编辑说明

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从汉代以后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士子和社会各阶层常读和必读之书。到了明清时代，又被定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所以《四书》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这除了历代统治者的提倡以外，主要还在于它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生活现实和人们认知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今天重新研读它，仍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这部《四书》皇家读本，是明代万历初年（1573—1582年）大学士张居正为年仅十多岁的小皇帝朱翊钧讲读《四书》的讲本。由张居正领銜和翰林院的讲官轮流为小皇帝讲解，讲解之后进行修改，再进呈给皇帝，让他课余时间在内宫阅读。由于朱翊钧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这个讲本是用明代最通俗的白话文写成的，既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而且很贴近生活，是一部很具时代特色、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四书》读本。此书原名《四书直解》，其中《大学·中庸》3卷，《论语》9卷，《孟子》14卷，共26卷。

三、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先读《四书》，次读经书或史书，《四书》先从《大学》开始，经书先从《尚书》中的《虞书》开始，史书先读《通鉴》，次读《贞观政要》等。这些讲本先后编撰成书的除了《四书直解》而外，又有《通鉴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我们已于1998年整理出版，取名《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很受读者欢迎。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古典读物知识，我们现将《四书直解》整理出版，分别取名《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孟子〉皇家读本》，统称《〈四书〉皇家读本》，供广大《四书》爱好者阅读。《书经直解》也已整理出版，取名《张居正讲评〈尚书〉皇家读本》，也深受读者的喜爱。

四、此书虽是专为皇帝读书而编写的，但编成之后，即流传至官

外,成为当时社会通行的《四书》读本之一。到了清代,此书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对讲官说:“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当时人将此书编成《四书直解说约》一书。所以整理此书很有文献价值,此次整理根据南开大学馆藏清代前期刻本。

五、这次整理仍遵循《通鉴直解》的整理原则,对该书《四书》原文和直解(张居正讲评)部分进行新式标点,另《大学·中庸》有注释、译文(今译)、今评部分,《论语》、《孟子》有注释、译文部分。注释是对《四书》原文和直解原文中难懂的字、词和典故进行简要解释;译文是只将《四书》译成现代通行的白话文;直解是明代通行的白话文,无需再译;今评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理解,对《四书》原文和张居正的直解,进行一些分析和阐释,以期古为今用。

六、目前《四书》的各种注释本繁多,我们的注释、译文,尽量择优参考。但张居正的部分直解,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们的译文尽量予以采用。此书的重点在直解,它的内容较《四书》原文更为丰富,整理工作以一人之力断难完成,所以我们采取多人分卷工作,最后由主编修订统一定稿。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特撰绪言作为导读。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和大方之家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改正。

目 录

大学	1
大学	3
中庸	53
中庸上	55
中庸下	92



